

2010—2019年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研究综述

□ 马淑婷

摘要: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材料是西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西夏时期的历史、文化和风俗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2010—2019年十年间,学界在黑水城所出西夏文诗歌在文本译释、艺术价值和史料考证方面取得丰硕成果,涌现出一批代表性著作和论文。

关键词:西夏;黑水城文献;西夏文诗歌

作者简介:马淑婷(1998—),宁夏银川人,宁夏大学西夏学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文化艺术。

目前已刊布的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文献材料集中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0册和《英藏黑水城文献》第2、3册中。西夏文诗歌大体分为党项民族原创、模仿汉文诗歌的拟作^[1]和夏译汉文诗作三类,其体裁主要有诗、词、曲、辩、赞、颂、谚语等,代表作品为《西夏诗集》《宫廷诗集》《曲子辞》《三世属明言集文》《忍教搜颂》《新集碎金置掌文》《贤智集》《五更转》^[2]、《圣立义海序》《新集锦合辞》等^①。

西夏文诗歌研究始于1935年的前苏联聂历山所著《西夏语文学》(莫斯科东方文学出版社,1960年),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一批前苏联和日本和西夏学者在这一领域贡献良多。代表成果有前苏联学者克恰诺夫《〈夏圣根赞歌〉——东方学文献的瑰宝》^[3]、《碎金置掌文:西夏文字手册》^[4]、《西夏谚语》^[5],日本学者西田龙雄的《西夏王国の性格と文化》^[6]、《西夏語〈月月楽詩〉の研究》^[7]等。由于资料限制,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

国内最早研究西夏谚语的是陈炳应先生。1980年,陈炳应发表了《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

的社会历史问题》(《西北师大学报》1980年第2期)一文,在写作这篇文章时,陈先生可能还没有见到克恰诺夫《新集锦成对格言》一书,此文应为陈炳应据其所见聂历山的遗著《西夏文字及其文献》一文所公布的部分西夏诗歌和西夏谚语作为研究资料,讨论了西夏诗歌和谚语所反映的西夏社会历史问题^[8]。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更多黑水城出土文献的刊布,国内相关研究逐步开展,在更准确地译释这些西夏文诗歌的基础上进行了文学批评与历史价值的研究。

2010—2019年的10年间,总计出版有关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研究专著1部,即梁松涛著《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②,论文40余篇,可以说是成果颇丰。

本文从整体认知和作品研究两个方面回顾和总结这一时期学界对黑水城所出西夏文诗歌在文本译释、艺术价值和史料考证几个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并对今后相关研究作简单思考和展望以就教于贤达。

一、整体认知

(一)西夏诗歌的艺术特点

黄震云、杨浣《论西夏诗》(《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检索到现存西夏诗歌主要有诗集五种。除无名氏拜寺沟西夏方塔《诗集》外,还有见于俄藏和英藏黑水城文献的《新集碎金置掌文》《新集锦合辞》等,收录《月月乐诗》《大诗》《新修太学歌》《解释歌义》等各类诗歌近千首,由西夏文、藏文、汉文、回鹘文、女真文和叙利亚文写成,以三至七言为主,有自己的章法和规范,整体建构方式参照《诗经》和汉语格律诗形式,主题包括佛教、民族起源和生存感受等。

聂鸿音《西夏诗歌用韵考》(《西夏研究》2013年第1期)及《党项诗歌的形式及其起源》(《西夏研究》2016年第4期)以西夏诗文集《三世属名言集文》和《贤智集》中的用韵现象为例,认为西夏诗歌作品句式灵活,不存在其《文海》式样的押韵,所谓用韵多是当时实际口语的反映。在此基础上,聂鸿音在《从格言到诗歌:党项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西夏民族文学中的“杂言体无韵诗”更强调“对仗”这一来自民间格言传统的核心要素^[9]。

赵阳的博士论文《俄藏黑水城汉文佛教文学文献研究》(兰州大学,2019年)从佛教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以俄藏黑水城汉文文献为基础资料,对西夏佛教文学进行整理研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西夏文学之概貌,总结了包括西夏诗歌在内的西夏文学具有讲究对仗技法的使用、中后期较为繁荣、上层贵族文学作品居多、体现佛儒道相融等特点。

(二)中原文化对西夏诗歌影响

聂鸿音《中原诗歌在西夏和契丹的传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一文认为,传入西夏的中原诗歌比传入契丹的中原诗歌影响力小,一是因为西夏人口少于契丹且国民文化水平普遍不高,二是西夏君王更偏好党项民族的文学创作风格。因此,西夏虽然接受了中原汉文化的政治制度,却并未在文学领域引发变革。

王昊《试论西夏文学的华儒内蕴》(《北京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基于“文化建构文学”的文学史观理论,提出西夏文学处于“近世文学”初期阶段的观点,而其汉文文学是典型的以儒学为根基

的文学,同时,西夏文诗歌谚语也带有儒家文化的因素。这种华儒内蕴的现象从一个侧面体现着西夏文化对中华“文化共同体”的认同。

(三)对学界以往研究的评述及展望

近40年来,随着黑水城出土文献资料的相继刊布出版,极大地推动了西夏时期诗歌作品的研究,但对西夏文学作品本身,尤其是西夏文诗歌的研究做精做透的学者仍是少数。汤君《西夏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学》2017年第2期)、梁松涛《四十年来西夏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西夏研究》2018年第4期)等文章在总结近年来西夏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对未来西夏文学研究的方向和方法进行思考与设想,提出未来西夏文学研究的关注点应集中在微观与宏观相统一、句读与历史文化相结合、文学与多个学科做交叉研究等方面,西夏文学研究应放在辽、宋、夏、金大背景下进行深层次研究。孙伯君《西夏文献与“丝绸之路”文化传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8期)从宗教学、语文学、文学等宏观角度论及存世西夏文献与河西走廊遗存文献、文物以及民间信仰之间的关联,肯定西夏文献对丝绸之路古代文明建构的重要价值以及对其加以保护的重大意义。同时,着重强调西夏俗文学和党项原创文学形式的格言对研究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及丝路各国民间文学形式具有重要作用。

二、作品研究

(一)《宫廷诗集》和《西夏诗集》

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宫廷诗集》保存较为完整,有甲、乙两种版本,是西夏官方文学的代表。

1. 专著 梁松涛著《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从西夏文《宫廷诗集》所录诗歌的内容入手,将此文献的两个版本进行对比研究。西夏文《宫廷诗集》甲、乙两种版本对比去重后共存诗33首,主要内容为怀古咏史,歌颂忠勇之臣、君臣和睦,歌咏西夏圣物和佛教劝世之作,反映党项民族对自然界的认知和西夏对佛教与儒家汉文化的吸收、借鉴及交融,反映了西夏境内党项、汉、吐蕃等多元杂糅的民族思想文化及社会历史史实。著作的下编对西夏文《宫廷诗集》的甲、乙两个版本进行逐字释读,为研究西夏文词汇提供宝贵借鉴。

《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特点鲜明:本书分上下两部分,互为依托,一方面,作者运用多重证据法进行严谨的文献梳理,对《宫廷诗集》的版本进行了严密的考证,采用“四行一注”的注解方法,在诗歌原文下紧附国际音标和汉文翻译,将重点字词的解釋詳列文末,结构体例明晰完备^[10],对每首诗歌的每个字做到形、音、义的统一。另一方面,作者以诗史互证的学术方法,跨历史、宗教、建筑、语言等多学科进行文化挖掘,厘清了西夏文学在文学史上独特的价值。

2. 论文 近10年来,亦有学者选取《宫廷诗集》或《西夏诗集》中某一首或某一特征进行研究,涉及版本学、文学、历史学等多方面的考证。

(1)在诗歌版本与释读方面。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版本考》(《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通过对《宫廷诗集》正面文书书写的刊刻时间及诗歌内容分析,考订其写作时间应在乾祐十六年(1185)至光定辛巳年(1221)之间,同时对《俄藏黑水城文献》所刊相关图版排序进行订正。孙伯君《西夏文写本〈整驾西行烧香歌〉释补》(《西夏研究》2018年第3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宫廷诗集》甲种本补足乙种本,运用“四行对译法”重新整理和释读了西夏文《整驾西行烧香歌》。

(2)在诗歌文学艺术方面。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用典分析》(《西夏研究》2011年第3期)与《黑水城出土西夏文〈宫廷诗集〉性质考》(《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两文,对西夏宫廷诗歌运用汉族和西夏民族典故手法表达内容进行了分析,并列举出《宫廷诗集》用典一览表。同时,将《宫廷诗集》定性为西夏宫廷乐府歌辞,考证了其于汉族宫廷乐府歌辞在艺术形式上的契合,认为这些诗具备演奏条件并对元代乐曲产生一定影响。

(3)诗歌所涉西夏历史与文化方面。梁松涛《西夏文诗歌所反映的西夏建筑特点及其文化特质》(《宋史研究论丛》2011年)从西夏文《宫廷诗集》中保存的5首与西夏建筑有关的诗歌入手,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西夏中后期官方建筑内外形制、风格、布局等特点及其所反映的儒家文化特质,认为西夏文化从建筑风格来看虽仍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更多吸收了儒家文化的精髓,使其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苏航《西夏文〈御驾西行烧

香歌〉中西行皇帝身份再考》(《民族研究》2014年第4期)将《御驾西行烧香歌》甲、乙版本与《黑水桥碑》汉、藏文文献对比研究后认为,《御驾西行烧香歌》中的西行皇帝为夏仁宗或桓宗,西行时间应在1176年以前或1201—1204年之间。

(4)《夏圣根赞歌》是学界引述最多的一首西夏诗歌。目前学界对《夏圣根赞歌》中“圣根”“黑头”“赤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认为其与西夏人的祖先有关,如张海娟、王培培译克恰诺夫《夏圣根赞歌》(《西夏学》2011年第2期)一文,通过对《夏圣根赞歌》的文本译释和分析,认为赞歌是描写西夏早期的历史和西夏祖先的事迹。刘景云《辉煌的华夏史诗:〈夏圣根赞歌〉》(《敦煌研究》2017年第4期)从中华民族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语音和字形结构分析《夏圣根赞歌》内容后,认为赞歌不单是描绘西夏历史的史诗,也是从党项民族角度描绘华夏数千年的历史诗歌,极具特色,诗中所涉祖先“黑头”“赤面”也是华夏祖先“舜”,“石城”“白河”“漠水”就是黄帝与神农、蚩尤争斗的古战场“阪泉”“涿鹿”,并附录作者、克恰诺夫和聂鸿音就《夏圣根赞歌》的译文对照表。

(5)《西夏诗集》共存诗5首,为《赋诗》《大诗》《月月乐诗》《道理诗》《聪颖诗》。因损毁和字迹模糊,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译本。俄罗斯学者对此研究较多,尤以克平为代表。2010年以后,国内学者将其著作引进并翻译,如王培培译《西夏文献中的“黑头”和“赤面”》(《西夏学》2010年第1期)一文,论述了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颂诗和赞歌的特点,认为西夏赞歌由庆赞语和大众语两种语言形式写成。其中,“黑头”代表的是西夏上等人,是西夏本土宗教“本西”法师后代,“赤面”代表的是大量百姓。杨蕤译《浅论西夏仪式语》(《北方语言丛论》2011年)以《月月乐诗》为例,分析该诗仪式语和普通语的异同,认为西夏仪式语是前佛教时期的产物,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二)《贤智集》

《贤智集》是西夏僧官鲜卑宝源所作的诗文别集^[11]。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西夏研究》2010年第4期)通过分析《劝亲修善歌》的形式和内容,展示了西夏说唱文学体裁“辩”是在继承敦煌文学“唱辩”题材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典范技巧和具体样式,为深入研究宋初以后的说唱文学的

发展提供参考。张清秀、孙伯君《西夏曲子词〈杨柳枝〉初探》(《宁夏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通过对西夏文《贤智集》中最后一篇《显真性以劝修法》的全文释读和体裁分析,研究西夏俗曲的范式,认为《杨柳枝》虽然是仿中原唐教坊曲而作,但西夏俗文学的风格与敦煌文学颇为相似,句式上不再严格遵守七言绝句的格式,并在句尾创造性使用三字“和声”,将其应用于长篇说教,以增强讲唱的气势。

(三)《西夏谚语集》

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是一部西夏中后期印刷出版的俗语民谚集,对研究西夏人民生活、风俗习惯、思想意识等具有重要价值。

郭勤华《从谚语看党项人的哲学思想》(《西夏研究》2015年第4期)认为,党项族谚语中体现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诸规律范畴等哲学思想是党项人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归纳总结的,反映党项人生产生活和状况的各个方面,并对研究党项族文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王培培《西夏谚语中的佛教因素》(《西夏学》2017年第2期)与《西夏语“罗睺星”的来源》(《宁夏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前者摘录《新集锦合辞》中部分出自佛典的谚语词条和富有佛教特点的词条加以分析,认为佛教思想深入西夏人的思想和生活中,后者通过对西夏谚语及其他西夏文献的分析,认为罗睺星是一颗复仇之星。王艳春《西夏谚语中的日月意象》(《西夏研究》2018年第4期)将黑水城出土《新集锦合辞》全集364条西夏文谚语中10条有关日月意象的谚语加以分析,指出在党项文化中日月意象的象征意义有三种:天文天象、圣贤和佛教文化。

(四)《五更转》曲子词

《五更转》源于中原,后流行于西北地区。目前掌握的资料表明这是一种小型的套曲,由一更唱到五更,每更一首至三首不等,每首有固定的句式^[12]。

梁继红《武威藏西夏文〈五更转〉考释》(《敦煌研究》2013年第5期)对武威藏西夏文《五更转》进行全文释读并与敦煌文献和俄藏黑水城出土西夏文《五更转》作了形式和内容上的比较,提出西夏文《五更转》是在继承唐五代敦煌民间文学基础上的创新之作。徐希平、彭超《俄藏与中国藏两种西夏文曲辞〈五更转〉之探讨》(《民族文学研究》2016年第6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五

更转》的源流和从中原传入河西地区之后的演变轨迹,认为西夏文曲辞《五更转》源于中原,但题材风格与中原《五更辞》差别较大,受敦煌《五更转》影响更为明显。

(五)其他

除对西夏文诗歌内容、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外,学界还从部分诗集的版本对勘角度入手研究西夏文献的特点和价值。景永时、王荣飞《未刊布的西夏文刻本〈碎金〉考论》(《敦煌学辑刊》2017年第4期)分析西夏文《碎金》的写本与刻本之间的误差、残存情况、版本特点及价值等。吴雪梅《宁夏佑启堂藏三件西夏文残片考释》(《西夏研究》2018年第3期)将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贤智集》〈劝亲修善辩〉和《新集锦合辞》与宁夏佑启堂收藏的编号为No.11的西夏文《贤智集》首篇《劝亲修善辩》残片和手抄摘录编号为No.11V的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残片作对比,依据孙伯君的录文对《劝亲修善辩》残片进行填补和修正,并罗列其不同版本装帧和版式的特点。

三、西夏文诗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研究展望

目前,西夏文诗歌研究以出土文献为主。囿于黑水城出土文献尚未完全公布,而已公布的大部分文献材料写于其他文书的背面,纸面字体难以辨识,加之西夏文草书释读难度较大等现实问题,使得相关西夏文文献的释读工作存在客观困难。因此,当前学界的相关研究仍集中在已释读的西夏文诗歌或汉文诗歌的西夏文译本中,主观选取倾向较强。今后可能需要加强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进一步提高对西夏文诗歌的释读水平,回归文学本质特别是诗歌艺术基本特征的研究

首先,翻译西夏文诗作要以忠实、准确的译释为根本。文本原意是什么,翻译解释就是什么,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能爱屋及乌,至少不能翻译错了。有些学者想当然地认为西夏人对中原典籍文化的理解水准很高,但事实上,传入西夏境内被译成西夏文的中原汉文诗作翻译水平普遍不佳。据聂鸿音等学者考证,西夏《诗经》译例中有半数左右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解,有的甚至可以说是严重失误^[13]。所以,西夏文诗作的译释要在合乎其

语法规则的基础上追求“信达雅”的标准。

其次,基本的研究要回归到文学、诗歌学的艺术本质。西夏文诗歌继承唐以来的律诗形式,对仗工整,具有极强的“空间美感”和传唱性。把握其文学性要从意境、个性、建筑、音韵等诗歌要素入手,分析和评价西夏诗歌的艺术特色与成就。

(二)既要做好诗篇的深入解读,也要注重诗集的系统总结

目前,数以百计的西夏文诗歌文献得到系统解读的寥寥无几,在这个基础上总结西夏诗歌的特征和规律条件还不够成熟,得出的结论还需要检验。

首先,要做好已刊布的诗篇的研究,最好是一篇一篇的反复释读。学界对《夏圣根赞歌》前后多次的翻译和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其次,要重视诗集的研究。诗歌往往是群体和时代文学风貌的集中反映。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再次,要完整地解读诗篇和诗集。国内研究成果论著通常集中于解读西夏文诗歌文献内的一两首或一首诗歌中的几个片段^[14],并没有把整个诗篇或诗集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文学特色和历史价值;还有的研究则因研究者的主观选择,将诗歌文本切割,选取研究所需,忽略了诗歌的完整性。

(三)应加强西夏诗歌文史互证的研究

分析文学作品离不开作者的创作背景和创作情感,尤其是其中描述社会生活、反映社会问题的诗作,对研究西夏历史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学界对于西夏文诗歌中反应的社会历史问题的探讨,角度还比较狭窄,分析还不够全面。有鉴于此,西夏文诗歌研究需要结合历史、文化、社会等多学科视角,将黑水城出土西夏文诗歌与传世文物、汉文史料相互印证,利用诗歌文史互证的功能,更好地还原作者的思想情感和西夏的社会风貌。

注释:

- ①限于出土文献资料较少,本文在学界研究的基础上,没有按照传统中原诗歌的划分,而是将黑水城出土具有诗歌“对仗”要素的诗歌、曲赋、谚语、佛教颂偈等文学体裁全部囊括在西夏文诗歌内。
- ②此外,还有聂鸿音《西夏文献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也收录有作者2010年以前的关于西夏文诗歌研究系列文章,如《西夏译〈诗〉考》《西夏文〈夏圣根赞歌〉考释》《西夏文〈新修太学歌〉考释》《西夏文〈天下共乐歌〉〈劝世歌〉考释》《西夏文〈夫子善仪歌〉考释》《关于西夏文〈月月乐诗〉》《西夏文〈五更转〉考释》《西夏文〈贤智集序〉考释》等。

参考文献:

- [1]聂鸿音.党项诗歌的形式及其起源[J].西夏研究,2016(4).
- [2]梁芳.西夏文学史料述论[D].银川:宁夏大学,2012.
- [3]克恰诺夫.《夏圣根赞歌》——东方学文献的瑰宝[J].东方文献,1968.
- [4]克恰诺夫.碎金置掌文:西夏文字手册[M]//中国和朝鲜文学的体裁和风格,莫斯科,1969.
- [5]克恰诺夫.西夏谚语[J].苏联民族志,1971(3).
- [6]西田龙雄.西夏王国之性格と文化[M]//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9卷.日本:岩波书店,1970.
- [7]西田龙雄.西夏語《月月樂詩》の研究[M]//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5,1986.
- [8]陈炳应.西夏的诗歌、谚语所反映的社会历史问题[J].西北师大学报,1980(2).
- [9]聂鸿音.党项诗歌的形式及其起源[J].西夏研究,2016(4).
- [10]李鹏飞.《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评介[J].西夏研究,2019(4).
- [11]孙伯君.西夏俗文学“辩”初探[J].西夏研究,2010(4).
- [12]聂鸿音.西夏文《五更转》残叶考[J].宁夏社会科学,2003(5).
- [13]聂鸿音.西夏译《诗》考[J].文学遗产,2003(4).
- [14]梁松涛.西夏文《宫廷诗集》整理与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责任编辑 孙广文)

— 125 —